

西欧民粹主义何以愈演愈烈

□ 高璐茜

社会结构变迁、时代转型、意识形态、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转变、福利国家和结构转型、人口结构和资本流动、国家和政党能力强弱，都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兴起和衰落息息相关。而民粹主义也不例外，西欧近年来民粹运动的兴起也是多层次、多因素、长期发展演变的一个综合性结果，其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有三个原因最为重要和关键。

身份认同危机

欧洲统一的历史源远流长，因欧洲文明都发端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又都信奉基督教，欧洲人历来都认为欧洲是一个统一整体的概念。两次世界大战又使得欧洲人民忍受了战争的痛苦和摧残，因此谋求和平、发展和统一成为各国战后共识。二战后，西欧的民主国家氛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全球一体化进程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从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各国谋求经济上互通有无，到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到1993年欧盟的诞生，各国谋求政治上合作共赢，欧洲一体化进程在不断进行着。此外，1985年《申根协定》的签订，极大地方便了成员国境内居民的自由流动，淡化了国境和边界的概念，增强了“欧洲人”的身份认同。2002年7月，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的合法货币，正式进入流通领域，为3亿欧洲民众所共同使用。这进一步推动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更增强了欧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之前，西欧国家在实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逐渐构架起“欧洲人的欧洲”的欧洲认同，在主权让渡过程中，“欧洲人认同”的心理建构在不断完善。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西欧国家经历了一场急剧增长的难民和移民危机，许多欧洲人甚至感觉自己的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正在逐渐被削弱，这样的“欧洲人认同”正在经历一场急转直下的瓦解过程。

难民和移民的到来，不仅仅在经济

核心阅读

认同危机、经济危机以及社会人口和价值观上的变迁，使得西欧各国的许多选民对民粹主义政党的理念趋向认可和认同，给西欧民粹运动兴起培育了丰厚的土壤，西欧在民粹风暴的裹挟下出现集体“向右转”的倾向。

安置和支出上给西欧各国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还进一步产生了宗教、文化、语言、价值观上的冲突。“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冲突已经开始上升为涉及人身安全、宗教冲突的重大社会问题，这种身份上的认同对西欧民粹的兴起有着十分关键的影响。

就像亨廷顿所说，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文明的“我们”与文明之外的“他们”。他认为，文明之内的行为与文明之外的行为的差别在于四点，即对他者的优越感（或偶尔的自卑感），对他者的恐惧和不信任，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不同的交流困难以及对其他民族设想、动机等的不熟悉。在危机和民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拉克劳对此有着深刻论述，他认为民粹的出现背后必定有危机的存在，而民粹则会进一步导致更深层面的社会危机。

福利国家后的经济危机

在民主政治框架下，欧洲的经济发展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势头，直到2008年被美国的次贷危机拖累和影响后，欧洲自己也深陷欧债危机的泥潭自顾不暇。现如今，欧洲的经济自身难保、深陷泥潭，主要体现在福利体系出现问题、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几大方面。因此，最终经济上的困难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危机，即左翼、右翼极端主义势力的快速崛起，一些国家的政党体系受到了挑战，而有些国家的政党体系则濒临崩溃。

福山认为，民粹兴起的首要因素就是经济原因，即西方中产阶级的衰落和

精英阶层财富的极度集中，其次是民主政治体制内在的脆弱性，最后是对外来者的仇恨和国家被外国人占有的情感上的文化因素。欧债危机可以说是当代西欧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欧债危机的出现改变了欧洲一体化这一历史进程。欧洲开始大规模出现经济危机，各国开始寻求自保之路。

此外，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认为，经济形势对于发达国家最底层的民众非常不利：“光辉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戛然而止，去工业化过程日益凸显，新兴经济体力量不断增强，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岗位不断流失，而这些国家中掌握大量金融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群体却从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欧洲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在近30年来越来越突出。时至今日，西欧的阶层分化已经基本完成，一部分是高度国际化、受教育程度高、掌握资本与权力的精英阶层，而另一群体则是西欧那些“被遗忘的人群（the left-behind）”，就是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中被淘汰的普通老百姓和所谓的“草根”阶级。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打击不仅是经济社会上的，更是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这也不难解释为何他们会将手中的选票投给反移民反难民和反对欧盟的民粹主义政党了。

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变迁

西欧的社会变迁主要体现在人口变迁和价值观上的变迁。

欧洲文明自起源到文艺复兴，再到近代工业化、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经历了经济上、文化上的辉煌时代和巨大

变迁。但是如今的欧洲，后工业时代下长期低迷的生育率和欧洲各国的严重老龄化导致了“人口危机”。人口数量增减和结构变迁对国家民族发展有着根本性、决定性、长期性影响和作用。欧洲出现了典型的“因人少而虚弱，因虚弱而混乱”的状况。欧洲的现代价值观理念也体现在生育观和婚恋观上。在后现代和后物质主义理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婚姻越来越抗拒，结婚率连年下降和离婚率的连年上升，进一步导致欧盟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青年劳动力的萎缩势必必要引进外来劳动力，比如接纳难民、移民和外来者，可是这样做の結果就是欧洲人口的外来化，必然导致欧洲人口结构和种族构成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因此来自民众的担忧与抗争也并非空穴来风。

长期以来，欧洲社会有两套话语体系 and 价值观念并存。一方面，是欧洲人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洗礼以来对传统价值观的坚持、继承和推崇，比如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理性、正直、宽容、尊重他人、责任感、礼貌、忠诚、克制、独立性等。而另一方面，是自工业革命实践和后现代时代以来，尤其是近年来难民和移民的侵入，部分人对自己国家、民族、社会和群体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习俗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急剧上升，强调本国人优先和本民族优先。在逆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对自我文化和民族属性的认同正在回归欧洲人的生活，对外来者的文化和宗教等排斥正在明显上升。

认同危机、经济危机以及社会人口和价值观上的变迁，使得西欧各国选民对民粹主义政党的理念更加认可和认同，给西欧民粹兴起培育了丰厚的土壤，这引发了近年来西欧“黑天鹅”频频飞出，比如2018年意大利大选首个民粹主义政党的出现，比如2018年瑞典大选极右翼瑞典民主党成为第三大政党，西欧在民粹风暴的裹挟下出现集体“向右转”的倾向。

战略视角

话语，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通过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文章等形式，引导国际学术界开展研究和讨论，让中国特色表达成为国际社会熟知的议题，让中国观点成为世界声音、成为国际共识。要更加自觉地构建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示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学理化、大众化、国际化水平，从而在国际风浪面前保持定力和担当，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从容应对各种挑战。

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要加强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一手抓繁荣发展、一手抓引导管理。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多出拔尖人才、顶尖成果。要贯彻“双百”方针，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不辜负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通过各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乡村兴则国家兴，要有序推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2018年9月30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历时13个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终于落下帷幕。三国一致同意将其重新命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协定（The United States- Mexico-Canada Agreement，USMCA），自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成为了历史。

为什么重谈 NAFTA

1992年12月美、加、墨三方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协议正式生效，至今已近25年。NAFTA的签订极大地推动了三国的经贸往来，北美市场一体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北美因此一举超越西欧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缔约三方都从该协议中获利颇多，墨西哥和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无须赘述，2016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支撑了美国内14万家中小企业。

2017年特朗普政府要求重谈 NAFTA 主要基于两个问题。

其一，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美国认为旧的 NAFTA 协议让墨西哥和加拿大受益更多，美国损失巨大，比如墨西哥廉价的劳动力使得美国的制造业就业转移，造成了巨大的贸易逆差；有必要通过重谈 NAFTA 改善本国贸易状况。

其二，NAFTA 的原有条款不能满足今天三国的经贸需要。协定签订20多年之后，今天经贸领域的一些变化无法在 NAFTA 中找到对应条款。事实上重谈 NAFTA，并不是特朗普的创新。在此之前，三国都已经认识到了 NAFTA 无法满足三国今天的经贸需求，部分条款已经不合时宜，比如原协定规定加拿大74%的原油和52%的天然气需要优先供给美国。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派谈判代表与加、墨代表进行了三年磋商，并在开放加拿大乳品市场、推动墨西哥劳工方面陆续取得了一些进展。

谈判过程

2017年8月 NAFTA 重谈进程正式开启。谈判伊始“以创纪录的速度”向前推进，三方的目标是在2017年年底完成谈判工作，以保证在2018年墨西哥总统大选和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完成相关程序。然而伴随谈判深入，争议性议题的展开，比如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的原产地原则、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劳工工资、“落日条款”等，谈判陷入僵局举步维艰，未能如约在2017年内达成协议。2018年4月，为打破谈判僵局，特朗普明确表示要以征收钢铁和铝关税为砝码迫使加墨在 NAFTA 谈判中让步，加拿大回应拒绝在关税压力下让步。随后美国改变策略，决定与加、墨两国分开谈判以推进谈判进程。8月27日美国单方面与墨西哥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初步原则性协议。28日，在美国多重强压之下，加拿大重新回到三方谈判桌上。9月30日，三方达成协议，历时13个月的谈判告一段落。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 USMCA 的谈判方式。该协定是特朗普上台后真正重启的第一个贸易谈判，很多国家都密切关注其谈判进程，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奥尔登认为 NAFTA 重谈将成为特朗普政府贸易谈判设定的样板，并推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作为一份多边协定，USMCA 经历了多边—双边—多边的谈判过程，实质性的议题磋商都是通过双边展开的，且过程中美国占有明显优势。当加拿大拒绝屈从于关税高压要求争取公平权益时，美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与墨西哥先行谈判，并对加拿大继续大棒施压。对此，特朗普毫不掩饰说：“坦白说，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对加拿大汽车征收关税，这是大量的钱，也是非常简单的谈判。谈判可能一天就结束，不同意第二天我就加关税。”

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美墨加三国协定

□ 熊洁 万容

USMCA 是 NAFTA2.0 版吗

尽管特朗普总统自豪地表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协定并非北美自贸协定的翻版，而是一个全新的协定。很多学者却认为 USMCA 是 NAFTA2.0 版，保留了原协议的主要框架，只是在部分章节上做了补充和调整。USMCA 协定共计35章，涵盖关税、农业、原产地原则、纺织品、海关与贸易便利化、投资、电信、金融服务、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国有企业、劳工、环境、中小企业、反腐等诸多内容。其调整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原产地原则、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劳工等条款中。

我们应当特别关注该协定的以下三点。

首先，汽车行业的原产地原则。USMCA 将汽车行业的原产地原则视为该协定最核心的议题之一，它将 NAFTA 现有原产地原则规定汽车行业要求区内产值含量比例不低于62.5%，提高到75%。2017年中国汽车零配件出口额达到496.6亿美元，显然原产地原则规定对中国这样的汽车零部件出口大国而言非常不利。需要指出的是，在第六轮谈判时，加拿大对提高汽车区内零部件比重条款表示异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批评加方，称其实质上削减了本地区汽车产业的工作岗位，让北美生产的汽车使用更多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正如美国学者艾米丽·布兰夏德总结的，尽管新的协定可能不怎么有助于提振或损害北美大陆的整体经济增长和富裕，但它将对于重新界定产品如何生产以及在哪里生产产生了强大影响。

其次，劳工条款。协议规定到2023年40%~45%的汽车零部件必须由小时工资不低于16美元的工人制造。墨西哥同意通过法律保护工会对工人的代表权，移民的劳动保护和妇女免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协定还专门指出，违反劳工法将成为缔约方制裁的理由。

再次，与“非市场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需要提前通告其他缔约国。根据新协议第32章“例外与一般规定”第10款，成员国如果与“非市场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不仅要提前3个月通知其他成员国，还要将缔约目标告知其他成员国，并提前至少30天将协议文本提交其他成员国审查，以确定是否会对 USMCA 产生影响。评论家都认为这一条款是专门为中国设置的，且不排除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签订经贸协定时继续附加这一条款。

世界经济

（上接1版头条）

着力提升原创能力和水平，坚持不懈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原创能力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竞争力，是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只有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够通过观察中国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形成能够解释中国概念和理论。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西方理论植根于西方土壤，如果不顾中国实际，套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发展，用西方的概念、范畴和话语生硬地裁剪中国实践，那么不但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而且容易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必须着力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能力和水平。

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能力和水平，要努力构建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学科设置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要坚持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的原则，既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引领作用，扎实巩固基础学科，又要加快发展应用学科；既要培育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又要传承好冷门学科、“绝学”等濒危学科，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科支撑。

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能力和水平，必须立足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坚持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写出有深刻洞见的著作，提出有独特创见的理论，创造有战略远见的学说。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总结中国实践，提炼中国智慧，创建能够准确深刻系统地反映中国伟大社会变革的哲

大文章。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既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又要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方的强大力量。既要有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能带动的新农民队伍；又要有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还要有一支专长于乡村治理，服务于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基层管理服务人才队伍。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

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加强组织动员，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乡村振兴参与机制。让各类人才在乡村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探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加强农村专业人才培养建设，加大“三农”领域实用专业人才培养力度。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引导和支持